



## 加快发展工业设计 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王晓红

工业设计是科技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综合运用科技、艺术、经济等知识,对工业产品的外观、功能、结构、包装、品牌进行提升优化的集成创新活动。加快发展工业设计,对于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品牌国际化,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全面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价值链高端延伸的现代制造业体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有过利用工业设计带动商品出口、塑造自主品牌、实现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大力倡导工业设计,建立和完善设计创新体系,加快设计成果产业化,提高工业设计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践和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广东是我国工业设计服务起步最早、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以深圳、广州、顺德、东莞等城市为主要聚集地,以珠三角制造业为主要市场依托,工业设计取得快速发展,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以政府为指导,以制造企业、设计公司为主体,以产业园区、基地为依托,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以院校、研究培训机构为人才培养载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制造企业重视设计,设计公司效益增长、设计市场交易活跃、设计园区聚集度高的发展局面,以及“设计产业化、产业设计化、设计人才职业化、设计成果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实践证明,工业设计对产业带动作用显著。据调查,广东已经形成了以创新设计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态势,目前工业设计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达28%。在实施工业设计战略的企业中,约有80%开拓了新产品市场,70%降低了产品成本,企业有40%的利润和25%的销售增长来自工业设计。近年来,一些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大型企业,平均设计研发投入占销售总额的2.5%。概括起来,广东发展工业设计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和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设计创意园区成为设计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广东形成了以园区聚集设计企业的模式,园区通过举办活动,组织设计企业走进东莞、中山等产业集群,了解制造企业的需求,加深对工业设计的认识,扩大了设计市场。目前,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订单是通过园区服务平台得到的。

第二,公共服务平台成为设计创新的重要支撑。目前,广东全省建成设计创新平台30多个。围绕省工业设计产业化,着力打造交易、金融、专利、人才引进和培训、共性技术研发、品牌推介等服务平台。同时,有关部门还扶持建设了一系列技术服务平台。如,创意产品孵化和交易平台、工业设计材料平台、工业设计快速成型技术开发平台、工业设计信息知识库系统平台、工业设计虚拟现实数据信息化平台等,为设计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第三,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解决了工业设计的人才短缺问题。广东省基本建立了工业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和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人才引进与实训平台也逐步完善,广东工业设计城与国内多所高校签订了人才引进及实训基地协议,并组团带领园区内设计公司到武汉、长沙等地高校开展人才招聘活动,有效解决了设计公司的人才困境。

第四,产业政策为工业设计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通过制定各种鼓励政策,引导制造企业运用工业设计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促进了设计与产业的对接。

### (二)

广东的做法和经验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业,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服务转变。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把工业设计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把发展设计服务业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提高生活品质、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强行业规划和引导,加强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同时,还要在人才培养、市场培育、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建立设计人才评价和培养体系。建立工业设计职称资格评定体系,稳定和扩大设计专业人才队伍。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设计院校聘请企业设计师,设计经营管理者任教,鼓励设计企业建立院校实习基地。

二是积极培育国内设计市场。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引导企业重视设计和使用设计;加强工业设计与产业融合,鼓励制造企业向设计公司外包设计服务;加强制造企业设计费用投入和设计创新中心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设立海外设计中心或收购海外设计机构。

三是提升设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国际设计服务外包,支持具有承接国际设计业务能力的公司提高国际化运营能力,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国际化设计企业。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设计机构,支持建立国际设计战略联盟。支持有条件的设计公司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跨国并购,扩大全球经营规模。

四是规范发展设计创意园区。设计产业园区对于聚集企业、增强规模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产业基础、人才基础、市场基础等环境条件,防止一哄而起和重复建设。应加强园区服务平台建设,严格入园企业标准,切实提高园区的运营质量、经济效益和企业化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本版编辑 赵登华

## 适应环境变化 把握战略机遇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分析起来,我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机遇期由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共同决定。深刻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对于我们科学把握外部环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看,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

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新旧力量相互博弈。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全球总体呈现和平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难得的国际机遇。

还要看到,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结构亟待完善,南北差距继

续扩大,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这些都给我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

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的阶段不同,但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发展,都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方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然持续显现,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的大背景下,结构转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应是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现实选择。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有效化解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就可以化为动力,机遇和潜力也能够变成现实。(华音)

# 国际经贸形势呈现新特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

经济将难以最终走向全面复苏。

### ② 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扩大之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摩擦从产品延伸到产业,从贸易政策发展到经济政策,从境外竞争环境发展到境内的政策环境。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除原有的反倾销反补贴这一传统手段外,也增添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如,加强进口许可管理等,一些发达国家还进一步通过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致使全球各类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矛盾进一步上升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各国对全球经济的关注重点正在向气候变化、环境、环境产品、信息化与投资规则等更广泛的议题,多边贸易体系出现扁平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甚至非政府机构参与到各类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短期看,未来3年至5年,全球化仍将处于低潮,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长期来看,随着全球治理的加强及国际秩序的形成,全球化的大趋势仍不会逆转。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应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的不利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应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

### ③ 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上升

从2001年启动至今,致力于从多双边角度推动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12年,早期也曾曾在一些领域取得过成果。但自2008年以来,谈判一直难有新进展。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危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其中。时至今日,“金融海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深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进一步增加。

在多哈回合谈判迟迟难见结果的背景下,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展开了自贸谈判并取得较快发展,各经济体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④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多样化

与金融危机相交织的欧债危机是冷战后欧洲经济发展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正成为世界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来源,舆论普遍认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市场失控、福利水平失真、一体化建设失序等深层次问题。而欧美高福利社会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日趋缓慢,难以支撑其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可以归结为欧美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丧失优势地位,导致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结果。

如果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资源配置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并使得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多哈回合谈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G20会议之争、中美矛盾、中日矛盾等都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二是大国间的竞争,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话语权之争、对核心资源的占有权之争等都已全面展开,如,美国在亚太推行的TPP战略,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布局及争夺主导权的意图;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发展模式等具有同质性,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而这种竞争体现的是发展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在国际事务方面,发展中国家则体现了更多的共同诉求。

适度竞争有助于社会发展,但在全球资源短缺的形势下,如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协调作用,将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形成新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协调机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的理念需要调整。发达国家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剧增,国内消费不足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恰在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结构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

### ⑤ 发展理念调整决定未来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一些学者已开始对政府过度干预、高福利社会、透支消费、实体经济空心化及银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价值失控等现象进行反思。

理论界对经济发展理念的反思还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职能定位等。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奉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实施的市场经济并非完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机制,现实情况是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共同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二者如何达到一种平衡,处理好哪些应是市场决定的、哪些应是政府必须干预的,否则宏观调控和治理效果难以发挥较好效果。反之则矛盾积累,失衡和扭曲并存,经济将难以进入稳定的增长期。

政府替代市场的结果会导致企业增长的动能不足,而政府的缺位会导致过度的利益倾向而造成社会不公,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要想实现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发展,欧美国家首先是要解决发展理念问题,形成可以集聚增长动能的新发展模式;其次,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积累社会财富,而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交易游戏;再次,要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协调发展模式,改革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由投机为主的经营转变为投资获利的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总体来看,未来的世界经济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新兴经济体将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体,其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将逐步提升;二是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仍将控制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边,发达经济体部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回归将有所加快,但不可能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回归。期间,跨国公司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链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新型的商业模式的推广都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与影响。因此,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只有发达国家从发展理念到经济理论上进行深刻反省,形成东西方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和谐增长理念,世界经济才可能集聚动能,重现生机,再次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并形成合作、开放、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 治生态顽疾当用猛药

赵玉

实践证明,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必须痛下决心,拿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来,针对一些顽疾下猛药、出猛拳。不如此,生态顽疾就可能变得痼疾入骨,人民就不能满意。

从我国过去的经验看,什么时候把治理生态顽疾当作大仗、恶仗、硬仗来打,什么时候就能取得显著成效。比如,我国是世界上遭受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被退化、土壤沙化、沙尘飞扬困扰着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土地荒漠化导致我国西部生态脆弱、人口贫困、经济滞后。然而,随着我国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注重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推进依法防治,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沙区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相结合的路子,治理荒漠化取得了

可喜成绩,为构筑北方生态屏障、改善环境和促进沙漠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世界治沙事业进步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只要横下一条心,下大气力治理,“沙老虎”也能被降服。

今天,我国面临的生态顽疾还有不少,在出重拳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上下同心,才能保证重拳之力落到实处,直击病灶。否则,上面政策再好,如果遭遇“下有对策”,碰到“弹簧门”,重拳就如同打到棉花上,再大再猛的力度也会被无形中消解。为此,要积极引导各级政府转变政绩观,树立绿色GDP意识,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 购买公共服务应规范

甄珍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服务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建、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暴露出很多问题。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无疑为补齐“短板”找到了应对之策。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把社会的积极性组织调动起来,不仅有助于增加公共服务产品数量和范围,满足服务对象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大大节省行政成本,促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从更深层次上说,也为“释放改革红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增强市场活力”开出了一剂良方,将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

实惠。事实上,按照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资本分布状况,许多社会公共服务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建设、使用和管理。近些年的实践也表明,不少地方在探索将教育、医疗、养老、城建等公共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效果明显。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如何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挖掘社会潜力、改善公共服务方面,尚存不少问题。比如,招标程序如何确保公开公正、防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招标过程如何防止暗箱操作甚至权力寻租?如何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避免重复建设?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购买公共服务中加以规范,加以细化和制度化。而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意在“简政放权”,绝不能在服务外包后当起“甩手掌柜”。

